

國難教育與精神教育：“九一八”事變後 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的集體反思

張龍平

[摘要] “九一八”事變喚醒了人們對於國難與教育關係的反思，國難教育思潮興起，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群體積極響應並參與其中。然而，基督徒的特殊身份以及基督教一直以來對於和平主義的追求，直接影響到他們對於基督教應當以何種方式救國的選擇。隨着民族危機的加深，民族主義的選擇幾乎代替了一切，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群體轉而反省自身，提出以精神教育作為應對國難的基本主張。這是中國基督徒的固有使命，也是基督教教育社會化的必然結果。

[關鍵詞] 國難教育 精神教育 基督徒知識分子 反思

“九一八”事變後，國難教育思潮興起，作為在中國同樣從事教育工作的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群體，無論是從國際道義、宗教情懷還是民族立場出發，他們都積極地參與這場教育救國行動。然而，基督徒的特殊身份以及基督教一直以來對和平主義的追求，直接影響到他們對於基督教應當以何種方式救國的選擇。隨着民族危機的加深，民族主義的選擇幾乎代替了一切，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群體轉而反省自身，提出以精神教育作為應對國難的基本主張。學術界對於此階段之基督徒知識分子個體的主張、基督教思潮、基督徒救國實踐等問題已有不少研究，^①本文擬以“國難教育”問題為中心，考察“九一八”事變後至“七七”事變前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群體的思想與選擇，以展現其在抗戰前後的貢獻。

一、“國難教育”的提出

近代中國多災多難，國難接踵而至，而真正將其與教育問題聯繫起來的，則主要從“九一

作者簡介：張龍平，暨南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歷史學博士。廣州 510632

^① 相關研究可見邢福增：《基督信仰與救國實踐——二十世紀前期的個案研究》，香港：建道神學院，1997年；劉家峰、劉天路：《抗日戰爭時期的基督教大學》，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吳梓明：《基督教大學華人校長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姚西伊：《中國基督教唯愛主義運動》，香港：基道出版社，2008年；李韋：《吳雷川的基督教處境化思想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劉家峰：《近代中日基督教和平主義的命運——以徐寶謙與賀川豐彥為個案的比較研究》，《浙江學刊》（杭州）2007年第2期。姚西伊：《曠野中的呼聲——20世紀前半期中國基督教和平主義運動與思潮》，許志偉主編：《基督教思想評論》第七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李焯：《“國家興亡，教會有責”——吳雷川的基督教救國思想評析》，《理論界》（沈陽）2009年第2期。

八”事變開始。事實上，自“九一八”事變後不久，中國教育界已經開始反思國難與教育的關係，有關討論常見諸報端，如：“中國之國難，一般人都認為是自九一八以來開始的，其實中國自鴉片戰後，沒有一年不是受帝國主義者之壓迫，如戰敗、賠款、割地，以及其他喪權辱國的條約，不可勝紀。考其原因，雖由於政治之腐敗，軍閥之橫暴，成年累月的作無謂內戰，但其實還是因為國家教育上之缺陷，以至釀成今日不可收拾之狀態。”^①“自前年九一八國難發生以來，我國東北遼吉黑三省被蹂躪，去年一二八江蘇上海寶山等處，又被屠殺，今一月三日山海關又告失守，並被將有歷史意義的明代嚴嵩所書‘天下第一關’的匾額，運東京獻俘陳列，以誇耀其侵略我國之武功。最近三月四日熱河又被侵佔，平津動搖，全國震驚，國家滅亡之禍，迫於眉睫。而所謂國際正誼，國際公約，有成爲不兌現的支票之勢，國家與民族存亡問題，時時刺激國人的心目中；但抗日救國，喚醒民眾，須賴教育，因此國難教育之呼聲不霎時而充滿全國了。”^②社會學家潘光旦在《國難與教育的懺悔》一文中也談到：“國難的形成，自有它的內因外緣，若就其內因而論，我始終以爲教育要負很大的責任。教育沒有教一般人做人，更沒有教一些有聰明智慧的人做士，沒有教大家見利思義，安不忘危，沒有教我們擇善固執，矢志不渝，也沒有教我們諒解別人的立場而收分工合作之效。我以爲近代的教育不知做人造士爲何物，是錯了的，錯了，應知懺悔。”^③

既然國難的形成跟教育有莫大的關聯，那麼中國教育界對於國難的應對自然會落到教育上，於是“國難教育”便成爲“九一八”事變後教育救國的主要聲音。所謂國難教育，即指“用教育這一武器挽救國難”，“要用教育的力量啓發大眾，訓練大眾，組織大眾，使大眾參加救國工作，挽救中華民族危機，爭取中華民族的自由平等”。^④在此前後，中國教育界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國難教育方案，其中最爲著名的是教育家陶行知代表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提出的國難教育方案。該方案對於國難教育的目標、對象、教師、課程、組織、文字工具、方法以及從事國難教育工作者應有的認識等八個方面進行了系統性的介紹。該方案提出：“中國已到生死關頭，我們要認識只有民族解放的實際行動才是救國的教育，爲讀書而讀書，爲教書而教書乃是亡國的教育。”因此，要“在行動上取得解決國難真知識，立刻把它傳給大眾，使它在解決國難上發生力量。甲、推動報紙雜誌戲劇電影說書人無線電播音積極針對民族解放之宣傳。乙、變通各校功課內容，使適合於解決國難之需要。丙、運用縣、市、鄉現有組織及集會，宣傳民族危機及解決國難的線路。丁、推動家庭店鋪組織國難討論會讀書會。戊、開辦或參加識字學校，使此種學校對解決國難發生效力。己、長途旅行，喚起民眾組織起來救國。庚、必要時遊行示威。”^⑤該方案在中國教育界引起了較大反響。此後，上海的生活教育社出版的《國難教育實施法與指導》成爲中國教育界踐行國難教育的主要指南。^⑥

二、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對於國難教育的回應

對於中國教育界的國難教育主張，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特別是從事教育工作的基督徒給予

- ① 吳自強：《中學校實施國難教育之我見》，《江西教育旬刊》（南昌）1933年第5卷3、4期合刊，第10頁。
- ② 熊壽文：《國難教育與救國》，《江西教育旬刊》（南昌）1933年第5卷3、4期合刊，第6頁。
- ③ 潘光旦：《國難與教育的懺悔》（1936），《政學罪言》，上海：觀察社，1948年，第151頁。
- ④ 王正：《救國陣線與國難教育》，《國難教育》（上海）1936年第1卷第1期，第2版。
- ⑤ 陶行知：《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國難教育方案》，《大眾生活》（上海）1935年第1卷第9期，第218頁。
- ⑥ 生活教育社：《國難教育實施法與指導》，上海：生活書店，1937年。

了積極的回應。事實上，自“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無論是出於國際公義、宗教精神還是民族立場，已對日本侵華的罪惡表達過自己的主張，並號召廣大基督徒參加救國運動。如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在“九一八”事變後不久即撰文提出五大主張：“一、將此次事實之真相，宣告於世界信眾，並聯合世界信眾，特別是日本的信眾，一致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犯中國、擾亂世界的罪惡；二、為中國政府與人民懇切祈禱，求上帝賜予團結的勇猛，同心的智慧，以對付國家當前的危難，也為世界一切主持公理者祈禱；三、徹底覺悟基督教對於中國民族精神上的貢獻，因此而加深信眾人格的訓練，以備國家的需用；四、本耶穌的精神，提倡對於日本經濟絕交及國民絕交。中國基督徒要主張凡是中國人民，在此壓迫與恥辱之下，絕對的不與日本人民有任何的合作。我們並不恨惡日本人民，但我們要日本人民知道我們對於日本帝國之罪痛心疾首，深願日本有覺悟的分子也起來主張公道，使其國家表示誠確的悔改；五、本耶穌的精神及信徒自己的理解參加救國運動。”^①

然而，當時的中國信徒對於採取何種方式救國一事卻存在很大的理解問題，基督教追求和平主義，此精神使廣大信徒產生了不少的困惑。“九一八”事變前後一度作為中國基督教唯愛主義的代表人物——時任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幹事吳耀宗曾提出：“我們絕對不參加一切戰爭，因為我們信戰爭永遠不能解決問題。我們並且反對一切從恨惡與報復心裏發生的武力。”^②“唯愛主義主張人類一切關係都應當以愛為原則，並且要用不違反這個原則的一切手段。這個愛是無條件的愛，愛一切的人，連仇敵都在內。”^③上海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也認為日本侵華給中國基督教學校造成嚴重的精神與物質上的影響，但基督教教育必須堅持國際和平與正義，不能隨便憎恨外國與外國人。一方面要自我反省，要認識到內戰和內部問題是中國遭受詛咒和外來侵略的原因，建議發起“和平主義運動”，抵制內戰；另一方面要鼓勵學生加入自強運動，做好為國犧牲的準備。^④於是，“基督教救國主義”與“基督教和平主義”便成為當時中國基督教界應對國難的兩大主張，但這兩種不同主張在教會內部的長期存在，不可避免地影響着中國基督徒的抉擇，所以教會內部才有人指出：“基督教裏的團體和個人對於國難的問題，一般來說，向來是持着一種不大清楚的態度的。”^⑤

國難當前，中國基督徒卻“不大清楚”，這無論是對中國基督教界的整體形象，還是中華民族的抗戰大業都會產生不良影響，特別是1935年華北危機後，中華民族已經到了亡國滅種的關鍵時刻，各種各樣的救國主張紛紛提出，中國基督教界不可能無動於衷。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基督徒在普世基督徒的宗教身份與中國國民的民族身份之間，不得不再次作出清醒的定位，也就在這時，不少曾經主張和平主義的基督徒的思想出現了轉變。吳耀宗便激烈地批評了這種“不大清楚”的態度，他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基督徒對於“基督教與政治的關係問題”認識不清、“基督教與救國手段的問題”認識不清，以及基督徒自身的“畏懼與惰性”。他認為：“宗教與政治是絕對分不開的。基督徒個人不但可以參加救國運動，也可以參加直接的政治工作，至於基督教團體，它不應當變成一個政黨，也不必與某一政黨達成一片，但它可以從超然

① 趙紫宸：《基督徒對於日本侵佔中國國土應當持甚麼態度》，《真理與生命》（北京）1931年第6卷第1期。

② 吳耀宗：《唯愛社信條和主張的一個提議》，《唯愛》（上海）1931年6月15日第1期，第17頁。

③ 吳耀宗：《吳耀宗覆倪清源》，《唯愛》（上海）1931年10月15日第3期，第18頁。

④ Herman C. E. Liu, “Christian Education and The National Crisis,” *The Educational Review*, Vol. XXIV, No. 3 (July 1932), p. 225.

⑤ 吳耀宗：《基督教教育與國難教育》，《中華基督教教育季刊》（上海）1936年第12卷第2期，第42頁。

的立場，去參加一切對於政治有直接關係的工作……我們對於別人提倡的運動，除了那些我們認為是絕對反動的以外，都應當積極的參加……畏懼與惰性都是由於認識的不清楚和修養的缺乏。”^①

吳耀宗“積極參與”的看法在當時教會內部頗具代表性，時任上海滬江大學國文系主任王治心認為：“基督教是主張世界和平的，然而應該知道要求和平的實現，必先要掃除和平的障礙。同時要積極地謀求自強，有抵抗侵略的力量與決心。對於擾亂世界和平的帝國主義，不怕犧牲，期望真正和平的實現，這便是我們基督教教育界所應擔負的責任。”^②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文字幹事張仕章認為：“我們要實施這種非常時期的基督教教育，就非先打破基督教中遺傳的成見不可。這種成見就是說耶穌基督是一個絕對無抵抗主義者或不參戰主義者；而基督教也是絕對不干涉政治問題的或不贊成社會革命的。”^③江蘇省立教育學院教務主任童潤之認為：“中國的問題不是如何圖強以侵略他人，而是如何自衛以防他人的侵略。基督教固然反對戰爭，但不反對維持正義與救護同胞。犧牲一己的幸運而謀大眾的福利與安全，這是自衛教育的理想！也就是基督教教育的真諦！”^④

在宗教思想上理清了“基督教和平主義”與“基督教救國主義”的關係之後，廣大的中國基督徒非常清楚地知曉，中國基督教界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反對救國，其分歧的關鍵在於救國的方式，而民族危機加速了人們對於基督教救國的理解。

陶行知等人的國難教育方案引起中國教育界的熱議，在中國同樣從事教育工作的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群體也積極地參與起來，他們反思國難與中國人及教育之間的關係。福建協和大學校長林景潤認為，國難之所以到這種嚴重地步，“一方是因為帝國主義者的急迫侵略，一方是因為我們本身過於懦弱無能。帝國主義者受政治經濟欲的驅使，用武力來威脅我們。我們的守土者斤斤於名位地盤的保持，或不能臨難不苟，或竟流為漢奸，以致國土日蹙，國命垂危。國內則因政治不修，百事不振，經濟崩破，災亂頻仍；加以民族意識薄弱，社會精神潰散，外患愈深，喪志墮落愈甚。而歸結在於國人營私心重，為善膽小的病根……現在帝國主義者所以敢長驅直進中國的，並不是全因我們戰爭的機械不堅，倒是以為國人肯為正義公道奮鬥犧牲的人太少。”^⑤王治心認為要實施國難教育必須先弄清造成國難的原因，他認為造成國難的原因有：“一、中國人的個人自由太多，團結的力量非常缺乏，所以一遇外患便無力抵抗；二、中國人對於學問的研究，向來注重形而上的義理，看輕科學為形而下的技術，是以科學落後，不能與世界各國抗衡；三、中國人自私自利之心太重，讀書人只知道謀自己的升官發財，圖豐富的享受，所以弄到讀書人不肯勞苦，勞力人不會讀書，形成了只有己不知有國的毛病。”^⑥曾任燕京大學哲學院院長的徐寶謙也持類似看法，他認為要“使受教育者明白國難之所以構成，一方面固然由於各國的侵略，然我國人之不振作、不合作、自私，實為其主要因素。所以，救國當從自救自強着手”。^⑦

① 吳耀宗：《基督教教育與國難教育》，《中華基督教教育季刊》（上海）1936年第12卷第2期，第42—44頁。

② 王治心：《我對於國難教育的意見》，《中華基督教教育季刊》（上海）1936年第12卷第2期，第40頁。

③ 張仕章：《基督教教育對於國難教育的貢獻》，《中華基督教教育季刊》（上海）1936年第12卷第2期，第36—37頁。

④ 童潤之：《非常時期的基督教教育》，《中華基督教教育季刊》（上海）1936年第12卷第2期，第46—47頁。

⑤ 林景潤：《基督教教育與國難教育》，《中華基督教教育季刊》（上海）1936年第12卷第2期，第35頁。

⑥ 王治心：《我對於國難教育的意見》，《中華基督教教育季刊》（上海）1936年第12卷第2期，第40頁。

⑦ 徐寶謙：《基督教教育與國難教育》，《中華基督教教育季刊》（上海）1936年第12卷第2期，第41—42頁。

既然國難的造成跟中國人，尤其是跟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出現問題有關，那麼教育——特別是基督教教育——便能充分地彰顯其歷史使命。事實上，在“九一八”事變後，趙紫宸就已提出過類似觀點：“我們認定中國的病態心理——中國的罪孽——是由精神物質雙重原因所致使，所以我們也認定中國今日的急務在於改造心理與環境兩事同時進行……但基督教的使命則在建設心理，脫度人生，創造人生……我們因鑒於教育對於建設新中國心理的重要，不能不懷疑現在教會教育的不切實不深邃，而思有以補救之。我們可以斷言，基督教的能否為中國創造新心理新精神，全視乎基督教教育的能否感化人格，栽培人格，聯絡學校與社會的實際生活，以為斷。”^①到1935年前後，民族危機加深，越來越多的基督徒知識分子認識到基督教教育應當在國難之中扮演更大的角色，陳子初提出：“吾國民族佔全世界民族之大多數，然以力量而論，則萎靡不振，精神渙散，此實因過去之教育對於民族的真實力量少有切實的訓練。即以吾基督教教育而論，平素以勇於犧牲，樂於服務，忠於國家為教育之中心，而成效未能特著，即在乎少下切實工夫。現在國難教育之實施，即應以全力積極灌輸吾中華民族最需要的根本力量。此種根本力量是內心的，不是物質的；是潛藏的，不是浮表的；是磨而不磷，涅而不緇的；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而吾基督教教育對於此種民族根本力量的培植，實負有重大的使命。果能根據基督教教育的特色，即勇於犧牲，樂於服務，忠於愛國三點上努力，切實的做去，我深知吾基督教教育對於國難教育——中華民族復興的教育，必有極大的貢獻。”^②因此，廣大基督徒知識分子認為在國難之中，以“精神教育”為特色的基督教教育可以發揮其特殊作用，基督徒救國除了“戰爭”之外，也能在自己熟悉的領域找到其用武之地。

三、精神教育：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的國難教育之道

既然基督教教育對於國難教育有極大的貢獻，那麼如何加強與改進中國的基督教教育？這便成為中國基督教界應對國難的關鍵所在。事實上，改革基督教教育是近代以來，特別是1920年代非基督教運動中中國基督教界早已形成的共識，“更中國化、更有效率、更基督化”是改革的方向，日本侵華戰爭更是極大地推動了基督教教育的改革。趙紫宸在“九一八”事變後認為：“我們今日必須要改革基督教教育，第一要精選教員；第二要縮小範圍，縮短戰線，有關門的，合併的學校，然後可以有精深而刻勵的教育；第三要使教育與宗教在精神上打成一片，要使學校與社會在生活上冶在一爐，如此則組織可嚴密，精神可專一，團契可深刻，人格可造就，而青年們可以得活潑而紀律化的引導。此是根本之論。”^③趙紫宸認為改革基督教教育的關鍵在於整合資源、凝聚力量，着重精神教育。

1936年3月，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頒佈《特種教育方案》，提出在國難時期中國的教育應：“一注重體格訓練；二改進精神訓練；三在知識與技能方面注重生產能力與特種教材。”^④對此，張仕章認為：“基督教教育對於國難教育只有一種特殊的貢獻，那就是《特種教育方案》內所提

① 趙紫宸：《基督教與中國的心理建設》（《真理與生命》，1932年），《趙紫宸文集》第三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468—469頁。

② 陳子初：《基督教教育對於國難教育之貢獻》，《中華基督教教育季刊》（上海）1936年第12卷第2期，第38頁。

③ 趙紫宸：《基督教與中國的心理建設》（《真理與生命》，1932年），《趙紫宸文集》第三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469頁。

④ 童潤之：《非常時期的基督教教育》，《中華基督教教育季刊》（上海）1936年第12卷第2期，第46頁。

的第二種基本目標：‘改進精神訓練’。”他認為現在全中國的基督教學校都應當特別認真地訓練學生，使他們具有“為世界和平而奮鬥的精神，為人類正義而犧牲的精神，又為民族生存而團結的精神。”因為只有這種精神教育才“可以指導民眾認清世界的公敵，分辨國家的友人，消除黨派的紛爭，結成聯合的戰線以促進反帝反戰的運動，而完成救國救世的使命。”所以他確信基督教教育在國難時期中的貢獻在於精神教育。^①

由此，注重精神教育便成為當時國民政府乃至中西教育界，特別是基督教教育界應對國難的基本主張。因此，在實踐中倡導和落實精神教育便成為抗戰前後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的主要救國方式，討論精神教育的具體內涵和方式便成為他們面臨的新課題。徐寶謙認為在國難之中，基督教教育應當：“一、使受教育者明白國難之所以構成，一方面固然由於各國的侵略，然我國人之不振作、不合作、自私，實為其主要因素。所以，救國當從自救自強着手；二、使受教育者認識本國文化之偉大、正史之悠久、遺產之豐富，藉以恢復民族固有的自信力。使之急起直追，擔任艱巨。不但從事救國運動，且將發揮中國民族對於世界和平固有的使命；三、使受教者知道一個民族要圖自強，要恢復其自信力，不必以損害他國仇視他族為條件。使他們知道世界，所以紛紜擾亂，正是因為人們不明白這個道理；四、使受教者知道我們不但不應仇恨別人損害他國，遇有相當機會時，反而應當幫助我們所謂之敵國敵人，使他們也能走上公義、友愛、和平的道路；五、使受教者知道自衛的戰爭，在理論上固然可以成立，然在實際上，純粹自衛的戰爭，歷史中例子甚少甚少。況且凡是戰爭，沒有不與仇恨報復的心理，虛偽的宣傳，及殺戮的行為相連的。因此，以戰止戰是絕不可能之事；六、使受教者知道仇恨報復的心理，既然不能救國，我們應當於戰爭制度之外，另找救國的途徑，以期打破國家的難關，根本解決國際間的難題。據作者個人的信念，深覺聯合各國同志(包括所謂敵國)，作成國際陣線，共同反對惡勢力，扶植善勢力，是今日一種切要之圖；七、使受教者深知救國的任務，各標語口號及一時的興奮努力所能勝。必須平日對於人格、志願，及學問、能力有長期的修養與準備，然後才能為國家社會造福，尤須勝過私慾，終能為民服務為國犧牲。”^②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的江文漢提出：除了盡量採用一般國難教育的內容以外，基督教教育“要將一向所提倡的人格教育，作更大的發揚，基督教的精髓，就是服務和犧牲兩點，國難期中，正需要養成一班能為大眾服務能為正義犧牲的青年”；“要格外看重思想自由與獨立的訓練，根據各國的經驗，施行國難教育時，最不可避免的危險，就是思想統制，基督教教育原是建立在信仰自由的原則上的，我們絕對不可讓統制的狂熱，斷傷了青年思想自由發展；“要努力培養民族的信心，現在中國的國難，如此嚴重，許多沒有志氣的青年，容易走上頹廢和灰心的路，基督教應該運用他所特有的希望與喜樂的福音，去抬高民族自救的情緒。”^③總結起來，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提倡的精神主要側重於國際層面的公義、友愛、和平精神；側重於國家層面的自救、自強、自信精神；以及側重於個人層面的自由、獨立、服務犧牲的人格精神。

對於如何增進以上精神的教育，基督徒知識分子們紛紛發表意見、提出看法。王治心提出：“一、宜注重團結合作的訓練，養成有紀律有秩序的精神。實行軍事管理，俾一班青年，進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退能操勞役以服務社會；二、宜努力研究科學，迎頭學上去，不但希望在科學能

① 張仕章：《基督教教育對於國難教育的貢獻》，《中華基督教教育季刊》(上海)1936年第12卷第2期，第36—37頁。

② 徐寶謙：《基督教教育與國難教育》，《中華基督教教育季刊》(上海)1936年第12卷第2期，第41—42頁。

③ 江文漢：《基督教教育與國難》，《中華基督教教育季刊》(上海)1936年第12卷第2期，第39頁。

有相當的準備，而且能夠生活科學化；三、宜普遍地灌輸國家意識，有犧牲小我的決心，謀大我的發展。”^①童潤之提出：“基督教是富有社會性的，所以基督教學校也當社會化。以往的學校大都是寺院式的，與社會不發生關係，久已失卻學校的主要功能。非常時期的教會學校，除訓練在校學生外，應負起推進一地社會事業之責；如組織民眾，訓練民眾，改善民眾的生活！提高社會文化等工作，均應努力進行。”^②上海麥倫中學校長沈體蘭提出青年要有“社會的意識、集團生活、特種訓練”，要讓他們“認識時事、到民間去、戰時訓練”。^③儘管他們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他們都提到了一個關鍵詞——“社會”，即基督教教育應當積極的走出教會，參與到中國社會的生活中來，基督教教育“社會化”不僅可以解決基督徒救國的困擾，也可以成為增進精神教育的主要途徑。

結論

自1922年巴敦調查團(China Educational Commission)提出基督教教育要“更有效率、更中國化、更基督化”以來，特別是經歷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運動，中國的基督教教育社會化進程已經全面開啓，並在各個方面加速與中國社會的融合，而1930年代日本侵華更進一步加深了這一進程。當國難來臨，全國民眾討論救國大計，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積極參與其中、表達立場、反省自身，並提出以精神教育作為應對國難的主要策略，這種行為本身就是基督教教育的社會化。正如時人所言：“基督教教育以培養博愛、犧牲、服務的人格為中心工作。其教義是以建設天國為目標，以人類一家，做出發點。所以反對弱肉強食，和互相殘害的戰爭事件而勉勵信徒為正義真理奮鬥，雖至犧牲個己生命亦所樂為。對於窮苦受迫負重的民家則必扶助救援使得豐富的生命。三千年來基督徒所以能負此濟世使命的，則在其根本信仰宇宙間惟一主宰的存在，而且這個主宰是公義、仁愛、大公無私。樂善厭惡的。所以善必終勝，惡必終敗。凡人從這原則立身行事即是與上帝同工，共參天地化育於無窮。這種信仰，和能應用這信仰於社會國家問題上的人格，不但是解除國難的最急需條件，也是理想世界所能造成的要素。”^④

“更基督化”是基督教入華的最終目的，“更中國化”被認為是實現“更基督化”的可能途徑，而“社會化”則是實現“中國化”的必然趨勢，這一邏輯鏈條是自1920年代以來中國基督教界解決自己困境的主要方式，1930年代的“精神救國”也沒有脫離其軌道。“打鐵還需自身硬”，從某種程度上說，從精神思想層面解決中國人自身的問題是共度國難的最長效的辦法，然而國難畢竟是短暫的，而精神教育卻要付出長久的努力不可，這或許是部分民眾詬病中國基督教界抗戰保守的主要原因。儘管如此，作為全民族抗戰的一員，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的努力不應被忽視。

[責任編輯 陳超敏]

① 王治心：《我對於國難教育的意見》，《中華基督教教育季刊》(上海)1936年第12卷第2期，第40頁。

② 童潤之：《非常時期的基督教教育》，《中華基督教教育季刊》(上海)1936年第12卷第2期，第46—47頁。

③ 沈體蘭：《非常時期之基督教學校》，《中華基督教教育季刊》(上海)1936年第12卷第3期，第42—43頁。

④ 林景潤：《基督教教育與國難教育》，《中華基督教教育季刊》(上海)1936年第12卷第2期，第35頁。